

党史研究丛书



四川革命烈士传

第三辑

SI CHUAN
GE MING
LE SHI ZHUAN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四川党史研究丛书·

四川革命烈士传

第三辑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党史人物传编辑组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七·成都

封面题字：张秀熟

责任编辑：陈文渊

封面设计：张传方

四川革命烈士传 第三辑（四川党史研究丛书）

中共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人物传编辑组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5 字数：125千

1986年6月第1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11316·40

定价：0.95元

编审委员会：杨 超 任白戈 张秀熟 安法孝
周 颐 陈 文 彭 塞 郝 谦

编 辑 组：乔毅民（组长） 张迪民（副组长）
毕 兴 阚孔璧 邓寿明

目 录

音容常在 丰碑永存

——漆树莱烈士传略……………漆泽邦（ 1 ）

血洒春熙路 不负少年头

——杨国杰生平事略……………张明荣（ 8 ）

刚直秉杰 雄风炜章

——任伟章传略……………潘广炎（ 19 ）

短暂的生命 光辉的业绩

——张光堡烈士传略……………蒲国树（ 33 ）

巍巍青山埋忠骨

——戚氏三兄妹事略……………敬文俊 邓万发
张启明 李文明（ 47 ）

红色“金钢钻” 光辉照后人

——冯登权烈士事略……………冯永学 李文明（ 53 ）

舍生忘死为人民

——周乾烈士传略……………邓万发 敬文俊
邢学顺 党国绪（ 57 ）

坚贞不屈 血洒羊城

——吴毅烈士传……………何锦州（ 60 ）

业绩垂青史 遗愿照后人

——记侯伯英烈士……………王煮熙（ 71 ）

壮志凌霄汉 碧血映丹心

——裴紫玖烈士传略……………张明荣（ 82 ）

“总有一天我们要审讯你们的”

——记李司克烈士……………李剑彬（ 91 ）

为党宣传 为人民呐喊

——张竞若生平事略……………冉光海（ 95 ）

忠心耿耿 壮志未酬

记蒋琼林烈士生平……………王永清（ 104 ）

盐都青史颂英雄

——邓熙之烈士传略……………袁承之（ 109 ）

一生辛劳为人民

戴治安烈士传略……………苏久鸿 吴化金 戴 尧（ 114 ）

为党为国 鞠躬尽瘁

——秦青川烈士传略……………史占扬 李德峰（ 126 ）

盐都忆巾帼 英名垂青史

——毛慈影烈士传略……………自贡市党史工委
青神县党史工委（ 138 ）

赣水悠悠 英名千古

——记杨达烈士……………贺星焘（ 144 ）

彭县党组织的创始人

——杨石琴烈士传略……………彭县党史工委（ 150 ）

晋容常在，丰碑永存

——漆树葵烈士传略

漆泽邦

漆树葵，号南薰（1892—1927年），四川江津县李市乡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他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富有正义感和斗争精神。毕生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于一九二七年“三·三一”惨案遇害殉难，时年三十六岁。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贡献却是卓著的，他犹如天际彗星，迅忽而逝，但却在茫茫夜空，留下了一道闪光的轨迹。这闪光，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轨迹，则镌刻于历史的丰碑，永不泯灭。

漆南薰早年在家乡江津中学读书，因反对学校当局无理迫害进步学生而被开除，遂返李市乡居。民国初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欺凌掠夺，国事蜩螗，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他满怀疾愤，在老家旧宅堂屋的照壁墙上，挥毫洒墨，奋笔手书了岳飞的五律一首：“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州。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踏阏氏血，旗臬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归神州。”借以砥砺自身和抒发心中的爱国激情。漆南薰当年忧国患时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抱负，跃然诗墙。

他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后，即赴成都考入联合中学，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

一九一五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始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分到第四高等学校正式就读。毕业后旋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那时，郭沫若也在日本留学，他们是青年时代的旧友，成都联中的同学，此时又于东京聚首。

京都帝大的经济学部，由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主持。他的讲学，享有盛誉，很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对漆南薰的熏陶尤深。在河上肇的指导下，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来观察、剖析中国社会。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决意深入研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为国人揭橥，借以唤起民众，开展反帝斗争。因此，在大学期间，就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着手搜集有关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资料，写成了一篇题为《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毕业论文。一九二四年，学竟归国，任教于上海法政大学，课余则潜心钻研中国经济问题。他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学术专著，书名仍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分上下两编，共十二章，约三十余万字。当时郭沫若也在上海，他们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见皆同。漆南薰将这部手稿送给郭沫若审阅，并请他为书作序。郭沫若手不释卷地读了一昼夜，对这部书作了高度评价，但认为书名不太响亮，建议改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漆南薰欣然赞同，并请了女书法家萧娴题了封面。在全书刊印即将告成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由北京来到上海，读此书后深为赞誉，但嫌书名在当时太刺目，于是改题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虽然马寅初把“帝国主义”改为“经济侵略”是寓有深意的，但在内封面，萧娴女士的题字仍保留着，而且书的每页边上也仍是竖印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无疑表明了漆南薰为宣传革命理论，甘冒政治风险的战斗精神。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解剖资本帝国主义入手撰写的。此书以极其丰富、无可辩驳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揭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书的

序言中指出，这种侵略扼杀了“我国人民中之有产者（指民族资产阶级）”。于是“有产者降为中产者，中产者沦于无产以酿成今日穷困之境”，“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国人如欲坐以待亡则已，否则“排除此资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取消此条约之不平等，时乎时乎不再来！”可见他撰著此书的目的，在于唤起民众，开展爱国反帝斗争。

随着我国社会民族危亡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他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如果说最初他只从大量统计资料 and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那么，在《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第三版“序言”中，则反映他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勾结的事实。他说：“我国之现势，‘五卅’恶潮未息，京中惨杀案又相见告”，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狼狽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他呼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要结合起来，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身体力行。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初版。该书问世后，轰动于世，社会反响强烈。于是一再重版，顿时名噪海内，特别在进步青年中间，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有许多人读了这本书，毅然投身革命，走上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一九五〇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邢西萍）在京接见烈士的女儿漆宗英时还谈起这本书对他的影响，说：“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读了南薰烈士的书参加革命的很多”。

一九二五年冬，漆南薰离沪返渝，继萧楚女任重庆《新蜀报》主笔，直到一九二七年“三·三一”牺牲。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积极热情地宣传革命，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或“时评”，此外，还写了三百篇文章，近百万字。文中，他热烈鼓吹革命，严厉抨击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把当时的《新

蜀报》办成为揭露时弊、鞭挞奸宄的社会讲坛。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十八两天里，北京段祺瑞政府大肆屠杀为力争废止“辛丑条约”进行请愿的民众数百人。因交通阻隔，消息滞于二十六日始传到重庆。《新蜀报》当即在第二天，以头版头条披露了这则举世震惊的噩耗，并以南薰署名，发表了题为《请国民一致声讨媚外性成之段祺瑞》的社论，严正指出：“今日祸国殃民之贼，殆无出段祺瑞右，是残民以逞者段贼之特长也”。对卖国的段祺瑞政府袒护日本帝国主义残杀同胞的罪恶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愤怒的声讨。接着，从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四日，他又连续发表四篇关于北京惨杀案的社论，列举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依凭，狼狈为奸的种种事实，向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是卖国军阀滥杀民众来表示他们忠于帝国主义之表现，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已呵为一气了。”“外人若无军阀之捣乱，则无机会以宰割我国，军阀若无外人之资助利器，则实难以生存。”旨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与此同时，他还编写了许多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小册子，象《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是不平等条约》等，每册万字以上，售价二百文，深入浅出地向社会各阶层宣传进步思想，普及革命知识。读者非常踊跃，争相购阅，同时还远寄日本，在中国留学生中也产生很大影响。《新蜀报》也因之声望卓著，遐迩闻名，成为重庆舆论界的一面披荆斩棘的旗帜。因此，他被誉为是继萧楚女之后的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此外，在党的安排下，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向时俊师的政治部主任。据烈士侄子漆克昌回忆：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工作时，见到刘伯承同志。因姓漆，刘伯承遂问及与漆南薰烈士的关系，并说：“我当时在重庆做党的工作，我是负责和你叔父联系的。”正由于漆南薰是在党的直接培养和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因此才能有那样的革命激情和无畏的战斗精神。

在向时俊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职务，在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培养训练了一批青年男女参加革

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的四川，大小军阀各据一方，横行无忌，他们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祸国殃民。一九二六年春，四川省党部奉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命，成立于重庆莲花池，在杨闇公、吴玉章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蒋介石得到反动政客卢锡卿、李仲公诸人密报，说四川党部“将不利于己”。蒋乃密令四川军阀头子刘湘早为扑灭。于是反动军阀密谋策划，一场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活动在急速的酝酿和准备之中。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下，漆南薰不顾个人安危，仍然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为了揭发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种种罪恶，他除了奋笔著文进行革命宣传外，还深入到群众中去公开演说，经常出现在江边群众集中的地方，面对如堵的人群，讲解时事，剖析形势。每当讲到军阀蠹国，外患深重之际，则慷慨激昂，痛切陈词，揎臂擦袖，疾首顿足。为此，军阀们对他切齿忌恨，多次扬言要杀害他。南薰蔑视这些无耻的恫吓，不畏强暴，临危不惧，致力于革命宣传如故。当时，他携眷寄寓在重庆白象街一幢房子的楼上，据他夫人凌树珍回忆，在那些日子里，漆南薰总是回来得很晚，每次回来，裤脚上溅满了尘土。问他做什么去了，他不愿实告。后来才知道，他经常去河坝演讲。他夫人为此十分耽心，婉言劝说他不要过于暴露，以免遭受暗害。漆南薰却坦然回答：“百年的老公鸡只死一回，怕什么？”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为争取解放而死，重于泰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胜利攻占南京，英、美帝国主义敌视国民革命，于当晚悍然炮轰南京城，死伤中国军民二千余人，造成“南京惨案”。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莲花池省党部领导下，重庆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及爱国市民，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通远门城外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暴行。这次示威集会，南薰被选为执行总主

席。事先就有人来家放信，叫他不要去参加开会，怕凶多吉少；也有军阀狗腿前来恐吓，企图阻止他去主持这次大会。南薰夫人鉴于子女幼小，深怕他出事，守候着不让他出门，三十日夜在床前整整坐了一夜，谁知凌晨打了一个盹，惊醒过来时，漆南薰已经不在床上。他走了，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和满腔热血奔赴会场去了。

三月三十一日清晨，各界群众队伍打着队旗和“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横幅标语，抬着旨在揭露封建军阀实为帝国主义之走狗的，以篾块编织而成通体糊纸，上书王方舟（王陵基）等军阀姓名的各种狗的模型陆续开赴会场。据萧华清回忆：“当天上午，到会的群众已经超过一万人了，在主席台上，一位司仪拿着传话筒，高声宣布开会。正在此时，大会主席漆南薰（树棠）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互笑着点头招呼。突然，会场人口处，砰！砰连响几枪，一些人往里面涌进。此时，会场的西南角和城墙上，又砰！砰地象放鞭炮似的响了一阵。接着，‘打呀，打共产党！’‘打呀’的吼声，从一群杂乱的人中叫出来了。”此时，漆南薰正走上主席台，已中弹受伤，他从主席台后面的城垛跳下，被事先埋伏在城外的军阀爪牙捉住，先用枪托在他身上乱打，然后把他拖至两路口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国民公报》载：“闻重庆此次惨变，反动派事先似有组织，故闻开会后，即拔出手枪，先向演说台指定漆南薰射击之。”实际上岂止是“似有组织”，而是证据确凿的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屠杀。漆南薰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洒尽满腔碧血与世长辞了。

紧接着，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卵翼下，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随即发布了“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秘字第1号）令”，诬蔑共

产党甚于“洪水猛兽”。通缉名单中计有吴玉章、毛泽东等193人，其中继萧楚女之后即是漆树葵（见革命文献第16辑·宁汉分裂与合作53至55页），其实当时他已经被杀害了，南京反动政府也许还不知道，故仍将他列入共产党首要分子名单，加以通缉。

残暴的反动军阀杀害了漆南薰，并丧心病狂地予以肢解示众。三天以后，遗体才在亲友们帮助下，以白绫装裹入殓，运回家乡李市安葬。十多年前，漆南薰满怀豪情，赍志去国；十多年后，他实践了自己少年时代以诗砺志的誓言，为革命、为人民、为捍卫神州大地，洒尽了满腔热血。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他，还觉不够解恨，嗾使其御用文人继续著文对他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鲁迅先生为此写了《某报剪注按语》的杂文，对反动派的无耻谰言进行有力的回击。鲁迅写道：“这岂但奚落了‘则其十之八九，确为共产份子无疑’的漆树葵而已呢，就是中国也够受奚落了。”在鲁迅先生笔下，他是与多难的祖国同休戚共荣辱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那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漆南薰同志虽死犹生，永垂不朽！

血洒春熙路，不负少年头

——杨国杰生平事略

张明荣

杨国杰是我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成都地区学运工作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之一。二十年代中期，他在梓潼县城读书期间，就曾组织和领导过学生向广大劳苦大众传播革命真理；在成都读书期间，又带领广大同学与学校中的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一九三〇年，他担负“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工作后，在华西坝的“反筑墙”斗争中冲锋陷阵，给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封建军阀以迎头痛击，取得了巨大胜利。同年秋，被万恶的封建军阀杀害于成都春熙路。这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党的好儿子，为壮丽的革命事业，以熠熠闪光的青春，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一）追求真理 勇于进击

杨国杰又名杨申甫，一九〇八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出生在四川省梓潼县双龙乡池塘湾（今仙峰公社禹门大队五生产队）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祖上，曾有少量薄田瘠土，尚属小康之家，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庭生活已渐趋贫困了。

杨国杰的父亲杨齐敬，是一个精通中医理论、医术，乐善好施的乡村医生。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医学事业，很希望自己的子侄

中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人继承他的事业，为群众解脱病痛，达到“济世救民”的目的。当杨国杰开始懂事的时候，他的父亲见他资质聪慧，勤学好问，对学医具有很多有利条件，于是，便决定倾注心血加以培养。他的父亲一面送他到附近的陶淑堂、冯氏祠等私塾读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奠定文化基础；一面又利用朝晨月夕的大好时机，亲自教他攻读中医典籍。举凡《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脉诀归正》、《辩证奇闻》和《八十一难经》等，杨国杰均循序渐进地一一熟读，且多能成诵。十六岁时，他的医理、医术已具一定水平，对一般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对症处方、独立操作。这时他跟随父亲四处为人治病，颇得群众赞誉。

跟随父亲学医、行医，按照父亲的说法是为了“济世救民”，可是，在几年的实践中，摆在他眼前的无数事实，使他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尤其是一九二四年夏天，他的家乡遭受百年罕见的旱灾，农田龟裂，禾苗枯焦，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少农民已濒临断口绝粮的境地。加之瘟疫蔓延，很多人更是挣扎于死亡线上。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反动统治者变本加厉地滥派田赋和税捐，极尽其敲骨吸髓之能事，弄得众多农户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其凄惨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杨国杰当时已是十七岁的青年，尽管对社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但反动统治者置人民疾苦于不顾，他却看得一清二楚。面对这一现实，他深深认识到行医虽能解脱群众的病痛，却不能从根本上使群众摆脱贫困。于是，他向父亲提出到县城去读书深造，寻求一条真正能“济世救民”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春天，杨国杰考入了县城内的通儒小学读书。学校开设的新课程，打开了他的视野，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和民主这样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勤学苦钻，常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

那时候，四川军阀割据。梓潼为二十九军田頌尧的防区，田

赋苛重，税捐如毛。驻防部队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驻扎在通儒小学的部队，擅自将桌凳砸烂当柴烧，学校当局根本不敢过问。训育主任吕匡衡虽然意见很大，也不敢正面和驻军交涉。杨国杰听到这件事后非常气愤，便一马当先，高呼：“有胆量的随我来！”说着，带领大批同学去质问驻军。在强大的学生队伍面前，驻军理曲词穷，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动。

为了揭露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宣传北伐军的胜利消息和大好的革命形势，唤起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杨国杰利用寒暑假的时机，邀约当地和在外读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他被大家推选为领导，经常到双板、双龙等场镇街头、舞台讲演和演出文艺节目。

杨国杰善于利用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发动群众和反动统治者斗争。一九二七年夏天，梓潼城郊一带旱象十分严重，老百姓忧心如焚，但地方政府却置之不理。东坝的农民群众自筹资金，在青龙寺庙内唱戏祈雨，观众人山人海，杨国杰突然来到庙内，假扮一道士，登上戏台布道，说：“明天一早，大家背上干枯的玉米杆到县政府去，要县大老爷立刻设法救济灾民，如果他们要阻拦或伤害你们，自有观音菩萨保佑”。第二天，老百姓果真这样做了，县政府的大堂上，干玉米杆堆得象山一样，群众乱吵乱闹，弄得县长周望希没法下台，只好安抚大家，答应发放救济，群众才纷纷散去。

在县城读书的两年时间里，杨国杰的父亲见他经常在外参加社会活动，忧心忡忡，怕出问题。为了把他约束在家里，便暗中给他订了一门亲事，趁他毕业回家之际，匆匆完婚。然而父亲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刚结婚不久，杨国杰便辞别了家乡，来到成都。

（二）在党的哺育下成长 在革命激流中拼搏

一九二八年春天，杨国杰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入成都师大附中高中班学习。

其时，主宰成都党政军大权的三军联合办事处，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借口打死省一中反动校长杨廷铨，出动大批军警，分别包围了各大、中学校，逮捕进步师生一百余人，省一中被强令解散。当天下午反动派不加审理杀害了袁诗尧，周尚明等十四位同志，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二·一六”大血案。成都政治形势急转恶化。面对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的险恶局面，杨国杰十分愤慨。他不愿意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辈，决心以一定时间学好功课，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从事革命活动上。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下，杨国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很快趋于成熟。一九二八年他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三〇年转为党员，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当时师大政治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反动气焰甚嚣尘上，特别是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的前身）和共产党的矛盾非常突出，这种矛盾和斗争既表现在学生与学生之间，也表现在学生与学校之间。当时掌握学校实权的一个训育主任，就是青年党人，如果在斗争策略上稍有疏漏，就要受到他的打击，甚至有开除学籍和投入牢房的危险。尽管如此，杨国杰却很少想到个人安危。有个与他相好的同学曾私下劝他说：“你这样干，太暴露也太危险了，还是应该注意点好！”但他却说：“既要革命，就不能光考虑个人危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会一事不成。”他以自己的进步思想和行动，影响教育和团结了更多的同学，赢得了全校进步同学的信任，树立了较高的威信。所以在学校选举学生会的斗争中，他竟以一个低年级同学的身份，被大家推选为学生会主席。